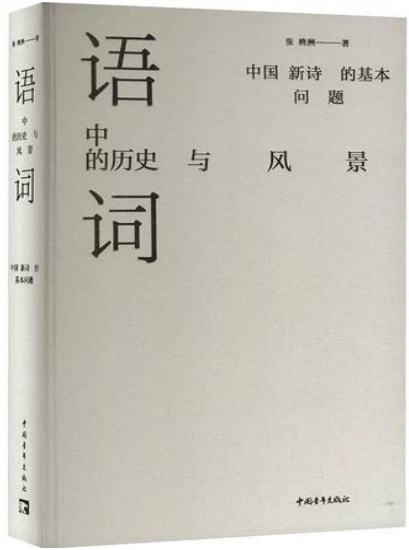


# “问题星丛”与范式转型

——读张桃洲《语词中的历史与风景》



张桃洲在新著《语词中的历史与风景：中国新诗的基本问题》(以下简称《新诗的基本问题》)后记中坦陈,这是一本耗时近二十年的书,可见作者推出此书时郑重的态度。正是因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基本问题”的反复体认、对问题图景的深描、对问题解决之可能或不可能的致思,使之成为一本颇具理论价值的新诗研究著作,不仅有益于反思现代诗歌批评与研究中的问题结构,甚至向我们透露出21世纪以来新诗研究范式转型的可能和限度。

如果说,张桃洲当年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是对中国新诗的“话语研究”,这本书则更进一步,呈现了话语与历史互动而形成的“基本问题”“问题链”或“问题星丛”,同时也是围绕新诗的“理念星丛”。据作者说,《新诗的基本问题》中部分书稿曾被用为博士后出站报告,可见两本书也可视为姊妹篇,此书的酝酿则从世纪初一直延宕到现在,迟

到二十年,而并不过时。我以为,这和作者很早就把握住了“话语”这一新诗研究的关键或转捩点有关,从语言(本体)到话语的转变用去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几年的光阴,实际上跨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作者也注意到,现代主义范式的新诗研究著作大多出版于九十年代后期以后,但其灵感和问题意识恐怕还是源于八十年代。而他动用的话语概念则显然包含并大于语言概念,也暗含了对语言本体论的反思。这是作者能够从“诗性空间”走向“基本问题”的动力。

基本问题是话语与历史角力的场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诗的基本问题》在研究的历史感上似乎要优于《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在前著中作者用心追摹的“问题星丛”与问题结构,最终来源于历史,属于一种现代性视域下的“历史构造”。我们会发现新诗的问题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历史结构。作者虽然也表示“基本问题”与“核心命题”同义,但似乎并不主张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作者的谦逊低调(正如书名采用的是“基本问题”而非“核心命题”),而和作者不断变换视角的视角主义的认识态度有关,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反结构的结构、反体系的体系,多元而又开放:涉及翻译、政治、宗教、身体、阐释、诗歌教育等诸多话题。

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和作者对尼采、维特根斯坦以来的现代思想的爱好有关。众所周知,在九十年代初,一股名为“后现代”的思潮影响和渗透中国当代文论甚深,但这一点是如何“收场”或收尾的呢?“后现代”与“现代”本来具有一种辩证关系,在某些领域,还可以发现“后现代”突破、僭越甚至取代了“现代性”的位置。可以观察到的是,在诗歌批评与研究中,“后现代”很好地融入了“现代

性”的理论视野当中。张桃洲成长于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氛围中,自然也在“后现代”哲学中浸淫甚深,但仍然使之服务于现当代诗歌研究。《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主要受到福柯与巴赫金话语概念的启发,而在《新诗的基本问题》中,作为理论依据与方法论来源的名单进一步扩大,包括进了诸如索绪尔、雅各布森这样的语言学家——正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现代思想,同时也有社会学方法,如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概念。我私下以为,栉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对《新诗的基本问题》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后者不同样探究了新诗的一系列“认识装置”的由来吗?

当九十年代的后现代思潮充分融入现代性的知识结构,在二十一世纪,新诗研究呈现出一种日趋多元化的研究态势,如出版了多部以身体、女性为题的新诗研究著作。《新诗的基本问题》提炼的问题链或认识装置也可能被进一步拉长。可以想见的是,未来国内针对一些单一问题的论著会更多,如自我、自然、心理等,它们应该也是“语词中的历史与风景”。

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处于新诗研究可能的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尼采所谓“旧榜已毁,新榜未立”之际,它可以代表那种综合的主题式研究向分析的问题式研究的转变,能够预见到未来的多元化研究局面。但另一方面,日益碎片化、“分崩离析”的研究会拼贴出什么样的总体性或整体性图景,似乎仍是未知。多元化研究态势的形成,固然得益于一种有关现代性的历史结构的破裂,但似乎同时意味着后者的未完成,亟须完成与再度完成。

该书的述学方式也值得注意。在行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诗歌灵感与哲学洞见的结合,也可以说是表现力与判断力

的结合。作者让他爱好的诗行和理论片段偶尔交叠,相映生辉,表现出本雅明式的对“引文”的收藏癖。但作者同时也具有智识上的洁癖,这保证了行文的简洁优美,否则可能发生壅塞。

这部诗学论著无疑践行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理想,在文学研究中,三者可以约等于义理、考据、辞章。非要分辨的话,作者可能更为倾向于诗哲融合的理想,并且以诗哲融通的方式勘探并重构历史,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内外平衡”的分寸感。他并非不重视历史,毕竟历史感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而是说,他对历史进行了一种暂时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悬置,从而摆脱了某种先验的历史结构或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的影响,仅仅因为历史主义者可能同时也是未来主义者。作者更在意“深层历史”中问题星丛的断裂与连续,仿佛只有如此,才不会被总体性裹挟。在此意义上,张桃洲的确可以代表“70后”学人中的一种典型态度,至少在诗歌研究领域如此。作者的诗学观念自然也受到程光炜、陈超、唐晓渡这一代批评家的启发,但近些年他对九十年代诗歌更多了一种“历史化”的观察和反思,也许因为有了了一定的历史距离或时间距离吧。我私心以为,在“70后”学人中,张桃洲最能了解九十年代诗歌的用心,但也是最具有未来性的批评家。他以“话语”为中心的诗学图景,也许受到“事件思想”的影响。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王东冬)



## 读书需静心

口述/王亿意 整理/本报记者 陈希子

在纷繁喧嚣的尘世中,读书宛如一场心灵的修行,而静心则是这场修行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

读书可静心,因为它能让我们在阅读中找到生活的美好。书中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有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有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有深刻的人生哲理。

当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感到疲惫与迷茫时,书籍便是那盏指引方向的灯塔。它能让我们暂时忘却外界的纷扰,沉浸在一个个文字构建的世界中,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读书不需要华丽的场所,也不需要昂贵的道具,只需要一颗愿意探索的心。无论是在阳光明媚的午后,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捧一本好书,便能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静心读书,需要我们选择一个安静的

环境,远离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干扰;需要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以一种平和、宁静的心境去面对书本。

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洒在书桌上,整个世界都还沉浸在宁静之中,这时候的我,仿佛能够更加敏锐地感受到文字的魅力。翻开书页,那些或优美、或质朴、或深邃的文字,如同清晨的露珠,清新而纯净,滋润着我的心田。

读到动情之处,我会情不自禁地微笑或叹息,仿佛书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书中的情感就是我自己情感。在这样的阅读中,时间仿佛变得缓慢,内心的浮躁也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与满足。

静心读书,是一种对知识的虔诚追求。当外界的喧哗被隔绝,内心的浮躁得以安抚,我们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去品味文字背后的深邃内涵。一本好书,犹如一

座宝藏,只有静下心来,才能仔细挖掘其中的珍宝。

无论是古典名著中蕴含的智慧,还是现代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人性光辉,都需在静谧的心境中去领悟。在静心的阅读中,我们仿佛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用文字搭建起思想的桥梁,而我们则在静心的阅读中,一步步走向知识的彼岸。

静心读书,能让我们在喧嚣中寻得一方宁静。现代社会节奏飞快,信息爆炸,人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纷扰所困扰。而读书,尤其是静心读书,却能为我们开辟出一片心灵的净土。这种宁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是一种精神的放松,更是一种对自我内心的回归。

诚然,静心读书也并非易事。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自制力,去抵御外界的诱惑,去克服内心的浮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往往习惯于碎片化的阅读,

习惯于在短暂的闲暇中匆匆浏览一些简短的文字。但这种阅读方式,很难真正让我们静下心来,深入地去理解一本书的精髓。

书籍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它不因时光的流逝而褪色,不因世事的变迁而改变。读书,是一种永恒的追求,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更是一种对自我的提升。让我们在书香中漫步,用文字编织梦想,用阅读丰富人生。

读书需静心,静心方能致远。在静心的阅读中,我们不仅能汲取知识的养分,更能获得心灵的成长与升华。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为自己留出一片静心读书的时光,让心灵在文字的世界中自由翱翔,去感受那些跨越时空的智慧与美好。

## 我的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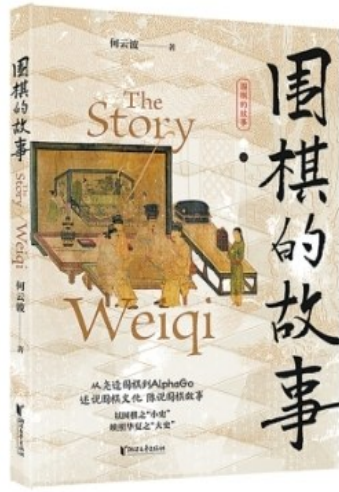
## 新书推荐

《教育改变了什么?》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分析教育与个人职业、生活、能力之间的关系,探讨教育的重要意义,尝试揭开教育如何改变人生的秘密。

《围棋的故事》



内容简介:本书按年代顺序梳理了围棋的发展脉络,讲述中国历史上与围棋有关的名人轶事,阐释围棋文化的丰富内涵。

《寻蝶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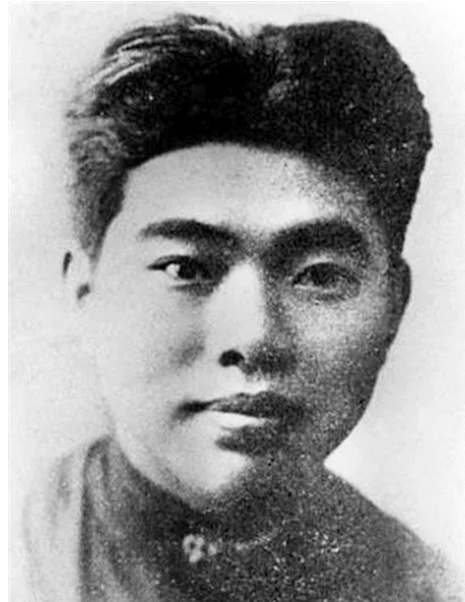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这本书通过300余幅手绘科学画,记录了77种蝴蝶寄主植物与83种常见蝴蝶的共生关系,为观察蝴蝶提供了方法指引。

(本报综合)

# 青年楷模何功伟

——鄂南敌后抗日开路先锋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白墩村,1941年牺牲于恩施。

(上接第11期)

也有的同志说:“统一战线不会破裂,而且肯定会巩固和发展。理由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已经产生《十大纲领》;十年连绵的内战之后,人民无不厌恶再继续内战。根据地减租减息,不打一般的爱国的地主士绅,统一战线已经有了成效。”

大家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认真探讨、总结,领会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及警惕民族奸细分子的精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春风,吹走了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影响,也吹暖了大家的心,鼓舞着大家在鄂南继续奋勇向前。

学习结束时,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我党对抗日战争领导的精神,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共咸宁县,由李一戎任县委书记。何功伟同大家一道,从谁家新屋到井头角,参加了咸宁县的第一次会议,共同研究了加强党在咸宁县的领导问题,讨论制订了咸宁县各部的工作计划。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功伟派何功楷和雷同参加国民党197师主办的鄂南青年干训班。训练班每天上课7小时,就有5小时说反共问题,但两人在训练班中发展组织同学会,得到了倾向进步的指导员、教员和学员的支持。在征得了校方的允许后,何功楷担任了同学会主任,雷同负责组织工作,很快就吸收了全训练班的300多名学员参会。

1939年3月,何功伟、吴铁钢、胡波等人一起来到梁湖抗日游击大队,与武昌县委一道研究,加强对梁湖大队的领导。到1939年4月,梁湖大队发展到500多人、400多支枪,活动

范围扩大到北抵鄂城梁子,东到沙咀,南及咸宁余花坪,西到斧头湖一带。与此同时,武昌县委委员舒江皋、潘斌等一批党员干部被何功伟调到樊湖大队加强领导。到1939年5月,樊湖大队发展到1000多人、700多支步枪、20多挺机枪,舒江皋任大队指导员,潘斌任大队副指导员,许大鹏任一中队长,沈池麟任一中队指导员,蒋鹏任五中队队长。

1939年4月,何功伟从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回到咸宁仙人墩。为保持与驻扎在平江的湘鄂赣省委的联系,中心县委决定在通山宝石河建立联络点。何功伟在中心县委所在地找雷同谈话,通知雷同担任阳(新)通(山)工委副书记,并提出要在宝石河开个小店,以此作掩护。他将中心县委一年所得经费的1/4给了雷同用于开店。

在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正确指引下,在湘鄂赣特委的有力领导下,何功伟和通山中心县委领导鄂南人民抗日武装对日伪主动出击,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9年5月的一天,驻金牛的日军百余人,由金牛维持会长何有吉带路,在涂镇掳掠后向金牛返防。下午4时许,当日军通过徐家桥时,遭到梁湖大队一、三中队的伏击,敌人皇之下纷纷落水,事后统计日军伤亡达10多

人。此次战斗,对日军震动很大。第二天,日军气势汹汹来徐家桥报复,却不敢过桥,只能架起钢炮胡乱轰击游击队战士埋伏过的山头泄愤。

1939年起,驻山坡日军经常去保福祠掳掠财物、强奸妇女。共产党员葛鹏程、艾声扬决心带领群众杀杀侵略者的气焰。7月上旬的一天,8个日本兵又到保福祠骚扰。葛鹏程在酒店假装请他们吃饭,当日军酒兴正浓时,突然用快慢机驳壳枪向他们射击,当即击毙4人,剩下4人冲出门外,有3人被群众用锄头、扁担击毙,1人逃回山坡。

咸宁马桥维持会干事、汉奸沈逢臣,经常带日军下乡,奸掳烧杀,强征粮食。1939年7月4日,咸宁抗日自卫队二大队中队指导员钱远镜和队长钱远熔得悉沈逢臣回钱沈村,当晚即率小分队12人奔袭钱沈村,将其从床上拖至该村土地庙旁枪决,并贴上布告:“替日军办事者杀无赦!”

1939年7月,驻武汉日伪军乘12辆汽车进犯豹解镇。樊湖大队一中队长许大鹏获讯,即率部埋伏在镇西的朱子桂山上。当敌人所乘汽车进入伏击圈后,游击队战士一齐开火,当场击毁汽车数辆,杀伤日伪军数十人。

正当何功伟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如火如荼日益壮大之际,在国民党反动派制订的“溶共、

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影响下,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指示其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在湖南省平江县嘉义镇,包围并袭击了我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捣毁湘鄂赣特委机关,杀害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等5人。湘鄂赣特委机关陷入瘫痪,通山中心县委也一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平江惨案”后,何功伟组织通山中心县委在鄂城涂家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出干部南下北上找党。黄全德南下找湘鄂赣特委,何功伟去江北找鄂豫边区党委。不久,何功伟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了联系,揭毁湘鄂赣特委机关,杀害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等5人。湘鄂赣特委机关陷入瘫痪,通山中心县委也一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鄂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安排好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隐蔽、撤退工作后,何功伟前往重庆,于8月间在重庆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组织汇报了鄂南形势。在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招待所,他参加了办事处为平江死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撰写了《鄂南工作情况报告》。

《何功伟烈士传》连载12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主办